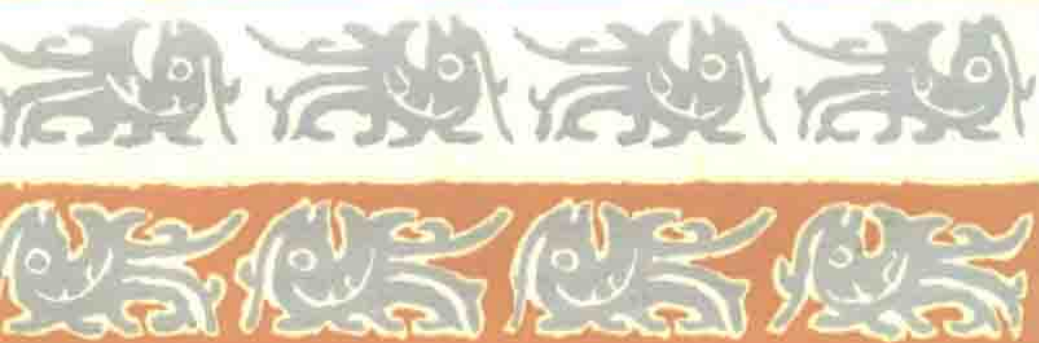


公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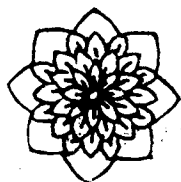
诗 论



四川文艺出版社

诗 论

公 木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杨 菁

龚明德

封面设计：杨守年

诗 论

公 木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1 字数194千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30册

书号：10374·157

(压膜本) 定价：1.65元

目 录

诗要用形象思维.....	1
前言 诗的光辉典范与特殊规律.....	3
一 文主发议论,诗主达性情.....	7
二 浮想联翩与联翩浮想.....	16
三 必然要接受世界观的制约和指导.....	26
四 必然要以语言为工具.....	33
五 必然要有逻辑性.....	41
六 富有思想的形象与赋予思想以形象.....	50
七 生产实践与美感活动.....	61
八 抒情主人公的性格形象.....	71
结论 既是认识的途径,又是表现的方法.....	80
后记.....	86
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	93
一 简论诗的本质.....	95

二 古典现实主义	103
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117
四 积极浪漫主义	129
五 先进世界观是诗歌创作的基石	146
六 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	160
 话说“第三自然界”	 191
 谈谈“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	 227
跋语	238
 政治·现实·知识	 245

诗要用形象思维

诗的光辉典范与特殊规律

（前言）

郭沫若同志《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中有句说：“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作诗填词，在毛主席的革命生活中，确是余事，却不是无关宏旨的小道。纵观古今，横览中外，毛主席诗词在诗坛上确实可称作“泰山北斗”。这些诗词反映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这些诗词体现着革命导师的伟大思想。我们学习毛主席诗词，必须结合着半个世纪以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来探讨，必须结合着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钻研。离开了革命斗争的实际，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理解毛主席诗词是很困难的，是办不到的；而这些也便是毛主席诗词中所反映的现实，所表现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主席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双结合的伟大史诗，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教科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主席诗词也如同雄文四卷和一切毛主席著作一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深刻反映，是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全世界进步人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战斗檄文。

但是，必须注意，它又和一般著作有所不同，它又和雄文四卷有所不同，它是诗词，是诗篇，是真正伟大的艺术诗篇。它是

在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现实基础上写出又推动了这一伟大现实的诗篇，它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写出又丰富了这一伟大思想的诗篇。这就是说，这里的现实（社会实践）和思想（革命理想）是经过美学点染和艺术熔铸的，它闪烁着炽热的灿烂的感情色彩和意志光芒。它是现实和思想的形象显现。同样作为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的形式，诗歌和论文，在有其共性的前提下，又各有其个性：论文抽象地解释世界，诗歌具体地说明世界，同时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抽象地解释通过证明提炼为概念，具体地说明通过显示凝铸为形象，两者都要达到说服以产生影响。假如说，概念是事物（物质）的本质属性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形象也并不仅仅是由对象的直觉反映即表象所组成，形象乃是不只饱含着思想而且也饱含着情感和意志的对于事物的认识。它是把思想、把情感和意志注入到由外界引起的感觉而形成的，它是观念的升华，它是意识的结晶。形象和概念同样都是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产物，在思维过程中，是属于同一序列的东西。而形象则是为感情所修饰为意志所加强了的认识，它赋予以理性以脉搏和呼吸，它是活的、有生命的，这也就是诗。至少，真正的艺术诗篇必须具备这种特质。有的论者，鄙薄诗的理性基础，怀疑诗的反映性能，只承认它是对性灵的抒发，而否定它也是对事物的认识。这种片面理解，推源其始，无非是把艺术形象，诗的形象仅仅视作直觉，甚至仅仅视作比喻或象征了。古今中外一切伟大诗人的伟大诗篇都不会停留在这个局限内，这是毋庸置疑的。毛主席的诗词乃是诗中的诗，诗的太阳，它是同一切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文人的作品具有着质的不同的无产阶级的诗篇，所以它正是我们学习和理解诗的特质的光辉典范。

作为光辉典范，我们来学习和研究毛主席诗词的精深内涵，就会发现：有一根巨大的闪光的红线，从始到终贯穿在这些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的诗篇中。它闪耀着战斗唯物主义和革命辩证法的哲理光芒，炽燃着深刻的群众观点的热情火焰，从而洋溢着超群拔萃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力量，这些就是无产阶级最坚定最彻底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毛主席诗词的灵魂。

作为光辉典范，我们来学习和钻研毛主席诗词的精美形体，就会认识：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学之一种，诗是现实的艺术掌握，理性的感性显现。它使用形象思维方法，通过加强了、往往具有一定节奏韵律的语言形式而形成，好的诗篇总是个别形象与普遍本质的统一。所有毛主席诗词都不只是告诉人们一件什么事情或讲述一种什么道理，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具体体现在栩栩如生的形象中，虽然诗篇并非世界观的图解。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是有关诗创作，艺术创作特殊规律的深刻揭示。这规律在毛主席诗词中充分地体现着。尽管曾经有人把形象思维判决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而打入死牢，形成禁区。但理论是灰色的，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创作实践总是遵循着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进行的。

那么，形象思维这一概念，又是怎样形成，从哪里来呢？

形象思维这一概念，在中国和欧洲都已源远流长，而把形象和思维两个词明确联系起来，则首见于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1811—1848）的著作。他曾反复说过诗或艺术是“寓于形象

的思维。”（《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及《艺术的观念》）又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讲述，诗人用形象和图画讲述，他们两人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对于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的意见》）把“形象”作“思维”的定语而形成“形象思维”这一术语，现在所知的最早例子，见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1901—1956）在一九三〇年的题为《争取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的演说中。他在批评文艺创作的空洞抽象的现象时说过“这已经不是形象思维”，并对形象思维作了极为精彩的解释。他指出：“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艺术家传达现象的本质不是通过该具体现象的抽象，而是通过对直接存在的具体展示和描绘，艺术家通过对现象本身的展示来揭示规律，通过对个别的展示来揭示一般，通过对局部的展示来揭示全体，从而在生活的直接现实中仿佛造成了生活的幻影。”尔后一般评论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评论家，便往往把科学思维称作逻辑思维，把艺术思维称作形象思维，而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对立。这固然是有道理的，却并不完全确切；这虽然并不确切，却基本上是有道理的。有的同志把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置代以抽象思维，似乎更比较恰当些。

一. 文主发议论，诗主达性情

散文直说，诗用图画。散文用逻辑思维方法提炼为概念，诗用形象思维方法凝铸为形象。这是诗与文的主要区别，前面已经提出过了。不过，正如列宁所说的“现象比规律丰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实际情况往往更加错综复杂。就以政治散文和政治抒情诗为例吧，二者有什么相同之点，有什么不同之处，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作出回答，是有助于对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以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加深理解的。

政论散文与政治抒情诗都是对一定现实政治现象的反映和评价，一定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是它们共同的基础，真理即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它们的共同内容。假如说政论散文，诸如社论、宣言、声明、演说等等，从基本性质说是属于科学范畴，对世界进行的是科学掌握，但它与自然科学不同，有时也不免热情洋溢，求助于联想和想象，使用着情感的热烈语言和幻想的灿烂形象说话；那么政治抒情诗，则如同一切诗歌一样，属于艺术范畴，对世界进行的是艺术掌握。但决不能为幻想所歪曲，为义愤所淹没，而必然同样燃烧着真理的晶莹火焰，也在判断和思考，甚至有时还直接发议论。

政治散文，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当然是伟大导师以其理论的解剖刀对当年政治形势的客体

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经过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达到理论概括；它把任何主观愿望的因素都滤除净尽，发现出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运动规律，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并应坚持“争取江西的计划”。这就是科学掌握。但是就在文章的结尾，在结语中论及“革命高潮”的现实性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却曾说（原著系散文，这里试改为诗体）：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
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
一个婴儿。

你瞧！这不是浮想联翩、激情满怀的诗篇吗？又如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七日）的报告，讲到长征的意义，是怎么说的呢？据曾经与会的同志回忆，当时毛主席是神采飞扬，富有风趣地说：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

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里，岂不也在流露着热情，并且使用着形象和画面来讲述吗？

政治抒情诗，如《如梦令·元旦》（一九三〇年一月），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很显然，作为诗篇，它重在表达行军感受，抒发革命情意，是精神的斧凿在现实生活的岩石上碰击出的火花。抒情诗的反映现实，亦即对现实的艺术掌握，则是要把由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固定下来，而这感受依然是由三大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认识。不过它是由意志所加强，被感情所修饰了的，往往演化为联翩浮想，翱翔想象的羽翼，飞架联想的桥索，通过幻想、夸张，使用比兴手法，以至孵育成活的形象。即如《如梦令·元旦》这首小令，同上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名文，不但基本上作于同时同地，而且写的同是当时当地的革命战争，自然具有着内在联系。如果没有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高瞻远瞩，则肯定是看不到这“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绚丽风光的。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而也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如果“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

念”，因而也“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如果不能确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那么是万万写不出这诗意葱茏、诗情酣畅的诗篇的。更万万不能写得这样有绘画美，象一幅鲜明的行军图；有音乐美，象一只雄壮的 进行曲。而且，“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一片火一样的红旗海洋，岂不正预示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这首小令和那篇名文岂不都是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一类右倾悲观论调的答复与驳斥吗？又如《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这里，同样讲的是长征。那视险如夷、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岂不也正是根生于对工农红军本质的深刻认识吗？而这种深刻的认识自然是有其坚实的理智基础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通篇总纲，便是经过思考所作出的判

断，这是不言而喻的。再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将古诫今，至理深情，沉着遒劲，瑰伟豪雄。除非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伟大战略家，除非是料事如神、指挥若定的革命导师，什么人能以这等濡染大笔发出这等警策的叮嘱呢？试看这些抒情的诗句，岂不正是《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的副本或续篇，并且隐有一整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做骨架相支撑着吗？对于现实的生活与斗争，这自然是最精深的评价最宏伟的议论了。法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说：“发议论——是人的特点和他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议论的作家——只是个手艺人。”诗人自然也不例外。只是这议论要怎样发法，诗与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诗与文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呢？那特点，亦即区别，是否只在形式格律上体现出来呢？诚然，格律形式往往成为区分诗歌与散文的重要标志，但这不是本质的问题，更不是问题的本质：有押韵的散文，也有无韵的诗篇；有八股文，也有自由诗。要区分散文中的情感与形象同诗篇中的判断与思考，还是必须正确理解诗主达性情，文主发议论这一基本特性。作为思想感情，诗人的与政论家的，与其他任何人的，都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对待日常事物，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该有什么

么两样。不过诗歌的表现，则必须通过达性情而发议论，思考与判断要形象地显示出来，使读者从“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那一片火样的红旗海洋中，展望到“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胜利前景；使读者从细浪五岭，泥丸乌蒙，暖寒金沙大渡，等闲万水千山的豪情胜概中，去体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本质；使读者在聆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谆谆叮嘱当中，领悟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湛深哲理；在这里“有情”亦即“沽名”；思想不是外加进去的，而是从形象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全部诗篇是有机构成，是浑然整体，所谓“必须一气浑成，神完力足，方为合作”（施补华《岷谿诗话》）。至于散文的表达，则是直接发议论，理智直接作用于理智。理智和思想直接碰面，无须以幻想和情感为中介，即使有时不免借助于情感和形象，也只是次要的辅助手段。它主要的是靠抽象的逻辑线索贯串着，无论是形式逻辑，抑或是辩证逻辑，判断和思考必须遵循着这根线索展开，连同它有时出现的情感的热烈言辞与幻想的灿烂形象，也只是缀在这线索上的花结。就象出现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航船”、“朝日”、“婴儿”等形象，就象出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等比喻，统统仍是置于严格的理智控制之下。我们读时只是被那真理的明确的逻辑力量所吸引，更加感到那真理是可信服的而已。诗歌对生活现实的反映与评价、亦即它的思想与感情，连同它的思考与判断，就不同了，它们主要的不是由一根抽象的逻辑线索所连结，而是必然为一个完整的感性形象统一起来，或者说都必然体现在一个完整的感性形象之中。比如《念奴娇·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但是我们读了它，却仿佛遥望到一位时代巨人，在铁